



安全理事会

第八十年

临时逐字记录

第九九一七次会议

2025年5月15日星期四下午3时举行

纽约

主席：	塞克利斯先生/乔治乌女士	(希腊)
成员：	阿尔及利亚	库德里先生
	中国	耿爽先生
	丹麦	兰迪女士
	法国	博纳方先生
	圭亚那	罗德里格斯-伯基特夫人
	巴基斯坦	艾哈迈德先生
	巴拿马	莫斯科索先生
	大韩民国	黄先生
	俄罗斯联邦	扎博洛茨卡亚女士
	塞拉利昂	托塔恩吉先生
	斯洛文尼亚	尤雷奇科女士
	索马里	易卜拉欣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吴百纳女爵士
	美利坚合众国	谢伊女士

议程项目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文本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更正应只对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送交逐字记录处处长(AB-0928) (verbatimrecords@un.org)。更正后的记录将以电子文本方式在联合国正式文件系统(<http://documents.un.org>)上重发。



下午3时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

主席 (以英语发言)：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我邀请塞浦路斯、伊拉克、以色列、科威特和土耳其代表参加本次会议。

根据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9条，我邀请以下通报人参加本次会议：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及和平行动部主管中东、亚洲和太平洋事务助理秘书长哈立德·希阿里先生；朝鲜战争被绑架者家属联盟主任李成义女士；以及伊泰·陈的父亲鲁比·陈先生。

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其议程上的项目。

我请希阿里先生发言。

希阿里先生 (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感谢你给我机会向安全理事会通报这一重要问题。

自第2474 (2019) 号决议通过以来，受武装冲突影响者的人数，包括据报在冲突中失踪者的人数，反而不断增加。仅在2024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登记了5.6万起新的失踪人员案件。并无冲突中失踪人员的全面数字，但我们足以知道情况严峻。在失踪人员的问题上，国际人道法禁止强迫失踪，要求冲突各方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查明据报失踪人员的下落，同时也规定家属有权获知有关失踪亲属命运的消息。

这是当前全球许多局势中的一个紧迫问题。

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武装团体之间的持续敌对行动继续在第2474 (2019) 号决议框架下引发严重关切。我们欢迎近期被释放的美国-以色列国民埃丹·亚历山大，他曾在加沙被扣为人质。这给人们带来了希望。亚历山大先生在经历那场痛苦磨难之后得以回到家人和亲人身边，我和秘书长一样对此深感欣慰。然而，仍有许多人失踪。据估计，仍有58名以色列人质在加沙下落不明，据推测其中35人已经死亡。尽管联合国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一再发出呼吁，但仍未提供任何关于人质状况或下落的可靠信息。公正的人道主义行为体也被拒绝进入。他们的家人仍在寻找有关他们命运和下落的消息。此外，以色列继续扣留巴勒斯坦死者的遗体，包括据报被埋在无名或编号坟墓中的人，这样做阻碍了家属获得信息并了结此事。自2023年10月以来，以色列当局拘留了数千名巴勒斯坦人，其中许多人仍然下落不明，这也持续引发严重关切。

在乌克兰，据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 (人权高专办) 报告，在俄罗斯于2022年全面入侵后，俄罗斯占领区的大量乌克兰平民遭到拘留，据报其中一些人被隔离监禁。据人权高专办称，其中一些情况可能构成强迫失踪。据报告，包括乌克兰儿童在内的数量不详的乌克兰平民也被转移到了俄罗斯联邦。我们欢迎最

近交换战俘和遗体，并鼓励双方加快此类交换的频率、范围和规模，并努力使乌克兰儿童能够安全返回家人身边。

在缅甸，自2021年军事接管以来，全国各地出现了人员据信失踪或下落不明的情况。据报告，至少有2000人在军事拘留期间死亡。一个主要关切仍然是，一些被任意拘留的人，包括民选文职政府成员，无法获得法律咨询和享有正当程序。

在过去数年和数十年冲突中失踪的许多人员的家属至今仍未获知亲人的下落。在朝鲜半岛，我们鼓励各方在先前努力的基础上继续推进朝鲜战争遗骸的归还工作，将其送回各自国家。

在叙利亚，失踪人员危机不幸成了冲突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叙利亚家庭明确表示，无论失踪者是谁、为何失踪，查明所有失踪者的下落对于过渡期正义和可持续和平至关重要。鉴于挑战的规模和复杂性，我们必须共同努力。这项工作必须由国家主导，并得到国际社会的支持。联合国欢迎叙利亚临时当局的承诺，并敦促其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失踪人员问题独立机构密切合作。

亲人的失踪给家庭和社区带来长期创伤。为失踪者家属提供答案可能需要几十年的时间。例如，1991年海湾战争人员损失的阴影仍挥之不去，至今仍有315名科威特公民和第三国国民失踪。

塞浦路斯失踪人员问题委员会的工作表明，失踪人员问题在事后几十年不仅对直接受影响的家庭来说是重要的，而且对整个社区也很重要。这显然并非塞浦路斯所独有。更独特的是当局的持续支持——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双方的领导人于4月份公开重申了这一点——还有长期以来双方就委员会工作建立的良好合作。再加上在实地或者在实验室工作的两族团队的专业能力，这些都是成功的关键因素，也有助于为和平解决塞浦路斯问题创造有利条件。

当失踪人员问题得不到处理的时候，不仅个人、而且整个社会都无法向前迈进。这可导致不信任与不满长期存在，阻碍可持续的和平。善意、持之以恒以及强有力的国际支持是寻找失踪人员的关键要素，遵守国际法也是一个关键要素。第2474 (2019) 号决议必须紧急得到充分执行。联合国继续致力于协助有关各方，包括通过发挥秘书长的斡旋作用。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希阿里先生的通报。

我现在请李成义女士发言。

李成义女士 (以英语发言)：75年来，我一直在等待父亲的归来。我叫李成义，是朝鲜战争被绑架者家属联盟的理事长。我很荣幸地来到安理会这里，正是安理会决定在朝鲜战争中派出联合国军来拯救我们。今天，我在这里分享我父亲的故事，他在朝鲜战争期间被强行带到朝鲜，希望安理会能够再次帮助我们这些战争受害者。

首先，请允许我花几分钟时间来讨论第2474 (2019) 号决议的重要性。尽管该决议是最近通过的，距离我父亲被绑架已过去很久，但是它构建了一个法律和道义框架，迫使国际社会查明失踪人员的下落。这项决议最终为我们这些家属提供了一种手段，藉此表达我们每天面临的悲伤，并寻求安理会提供补救和解决方案。

现在,我谨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组织——朝鲜战争被绑架者家属联盟。本联盟由被绑架者的妻子们于1951年在战争期间创立,一直存续到20世纪60年代。在初始阶段,联盟开展了旨在营救被绑架者的活动,并三次编制了被绑架者名单,其中包括一份英文版本,发给联合国军司令部。在长达40年的休眠之后,被绑架者的后裔于2000年重新振兴了该联盟。此后,我们找到了已知存在的12份隐秘名单中的11份。我们还发现了来自俄罗斯、中国和朝鲜的一些重要文件,证明了绑架的事实。

尽管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我们做出了各种努力,但是我们仍在等待和思念我们的亲人,不知道他们在哪里或者他们过得怎么样。

这是我父亲Jong Ryung Lee在1940年代担任检察官时身着朝服的照片。这是我父母的合影。当时,我的父亲是一名42岁的律师,是七个孩子的慈爱父亲和丈夫。他被朝鲜政权有计划地强行带走。我是他最小的孩子。当时我只有18个月大,对他没有任何记忆。我一生都在想象有父亲会是什么感觉。我的母亲是一位没有受过教育的传统女性,在失去家里唯一养家糊口的人之后,多年来不得不含辛茹苦以确保我们家庭的生存——就像许多其他被绑架者的家庭一样——她心头的伤疤永远无法愈合。

尽管有各种明确证据,包括来自我们这些在世的目击证人的证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始终未承认其绑架的罪行。这是一种仍在进行之中的罪行,是首例也是规模最大的强迫失踪案件。假如本案在发生的当时得到妥善解决,随后在日本、泰国和罗马尼亚等许多其它国家发生的绑架罪行本来有可能防止。正因如此,必须首先解决朝鲜战争被绑架者的问题,因为它确实是首例、规模最大、证据最确凿的案件,受害者人数近10万,它也是解决后续案件的关键。

因此,作为战争期间绑架受害者的家属,我们要对政府、国际社会以及联合国、特别是安全理事会说以下一番话。

首先,请让朝鲜确认受害者的生死。如果他们还活着,就应该让他们返回本国;如果他们已经去世,则应该返还遗体。

其次,请积极寻求采取实用措施,以追究朝鲜的责任,例如向国际刑事法院提出投诉,确定其责任,或者采取任何其它可能的实用手段。

第三,请查明事件真相,恢复战争期间绑架受害者的荣誉。务必运用第2474(2019)号决议来追究责任人的责任,同时把我们的案件作为强调的重点。

时间正在耗尽。许多被绑架者的兄弟姐妹和配偶已经去世。和我们一样,他们的子女也年事已高。我们感到剩下的时间不多了。悲哀的是,我们与许多其他受害者、比如战后被绑架者、被拘留者和战俘及其家人所感受到的悲哀是一样的。根据第2474(2019)号决议,我强烈敦促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确认我们亲人的下落,并确保遣返。

家庭是人类最根本的价值观之一,而人类本该团聚在一起。绑架和强迫失踪是严重的危害人类罪,它们在继续制造悲剧。我诚挚地恳请所有人——不仅是我国政府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还有国际社会,包括安全理事会——挺身而

出, 保护家庭团聚的人权。我真诚地相信, 安全理事会将站在前沿, 处理该问题, 把它作为一个有待解决的优先事项。

最后, 我谨宣读一首诗, 这首诗的作者是一位身份不明的被绑架者, 于1951年在平壤的一座监狱中发现。

啊, 我的祖国, 啊, 联合国

自由, 你是永生的凤凰

背井离乡

铁幕般的地狱

我们被拖向地狱般的死亡

啊, 我的祖国, 啊, 联合国

我们坚信, 你必将解救我们, 远离这座地狱和这种死亡。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陈先生发言。

陈先生 (以英语发言): 在开始发言之前, 我要感谢李成义女士今天来到这里。我们之前进行了简短交谈。我以前在韩国工作过。我听说过许多像李成义女士这样的悲剧。我认为这就说明这是一个普遍问题。我们都有同样的痛苦。因此, 我感谢她来到这里与我们交谈。

主席先生, 感谢你给我机会向安全理事会通报情况。我还感谢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呼吁召开本次会议, 并邀请我通报情况, 因为我的儿子是仍在加沙的美国人质之一。

我是伊泰·陈的父亲。伊泰是一名美国-德国-以色列公民, 被哈马斯关押在加沙已经587天了。看看这个孩子, 他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孩子。可以说无忧无虑。他热爱篮球, 昨天该看NBA比赛的。他是一名童子军辅导员, 有一个很爱他的女友和两个兄弟姐妹。我和我的妻子Hagit Chen——德国-以色列公民——以及我的小儿子Alon一起来到这里。Itay 18岁时加入了以色列国防军, 在致命的2023年10月7日, 他驻扎在以色列-加沙边境。他和他的分队与哈马斯战斗了几个小时, 保护以色列平民免遭强奸、活活烧死或杀害。最终, Itay的坦克被哈马斯压制住, 四名坦克成员中三名被劫持到加沙。

自那以来, 我的家人, 以及亲人被哈马斯和伊斯兰圣战组织扣为人质的其他250个家庭——来自超过25个不同国家和五种不同宗教——一直在努力了解亲人的命运, 争取他们获释。3月24日, 我的家人接到以色列国防军的通知, 说Itay很可能已因10月7日袭击而丧生。但是19个月以来, 哈马斯一直不愿意承认他们在他们手中, 也不愿意确认他的身体状况。我认为这是最低级形式的恐怖心理战。我谦卑地问安全理事会成员: 什么样的人会把逝者当作谈判筹码? 谁会剥夺逝者应有的最后一点基本的人的尊严? 我们家所遭受的一切——这种故意隐瞒我们儿子的生死命运, 拒绝将他交还给我们的做法——这种长时间听不到任何消息的过程是一种缓慢而持久的心理折磨。

请看看我儿子：14岁。他现在应该在哪里？他应该在学校上学。相反，他在这里和我一起努力找回他的哥哥。这并不正常。联合国酷刑和其他残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的待遇或处罚特别报告员爱丽丝·爱德华兹医生承认，人质的家人本身也可能是酷刑的受害者。她指出，长期处于不确定、不得真相、不知生死命运可能构成不人道和有辱人格的待遇。这就是我们每天面对的现实，没有任何令人宽慰的迹象。今天，以色列有30多个家庭与有着同样的命运。我要指出坐在我后面的利亚·戈尔丁，她是哈达尔·戈尔丁的母亲。十年半来，她一直在为儿子从哈马斯手中获释而奔走，并在通过第2474（2019）号决议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我感谢她今天和我们一起参会。

第2474（2019）号决议于2019年6月由安理会全部15个成员一致通过，由科威特牵头，科威特代表将在这里发言。该决议标志着国际人道法迈出了历史性的一步，正式承认家人有权了解冲突地区失踪亲人的命运。第2474（2019）号决议规定，武装冲突当事方——包括国家行为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如哈马斯——有义务搜寻失踪人员并查明其下落。哈马斯拒绝提供信息也不让接触人质，甚至拒绝向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缔造和平的实体提供信息或接触人质，这显然违反了该决议和国际法。

该决议支持追究劫持和绑架方法律责任的机制，包括当此类行为达到战争罪和危害人类罪的程度时。哈马斯有系统地藏匿人质达到了这个程度。第2474（2019）号决议为联合国及其会员国提供了一个法律——但更重要的是道义——框架，来谴责哈马斯的行动并制裁其支持者，如伊朗。安全理事会应首先要求释放他们手中的已故人质。此外，该决议不仅将哈马斯扣押已故人质的问题视为政治或军事问题，而且还将其视为安全理事会决议规定下违反国际法的行为。我们要求、乞求并期盼联合国支持它自己通过的决议，真刀真枪地加以执行。必须追究扣留死者遗体和故意剥夺家属哀悼权的人的责任。第2474（2019）号决议绝不能流于象征性；它必须具有可执行性。

我还要提请注意第2474（2019）号决议背后宗教层面的意义。该决议依据的基础很简单：今天坐在这里的所有人都是上帝的孩子，共同生活在这个地球上。因此，作为有信仰的人，所有人都应坚持一些基本原则。我要借此机会感谢教皇利奥十四世，他在第一次周日布道中呼吁释放加沙所有人质，呼吁停火。

令已故人质的家属感到沮丧的是，由于政治原因，这项决议没有得到执行，由此让人认定：劫持人质，甚至已故人质，能带来奖励，而非惩罚。有一个必须解决的结构性的缺漏。尽管通过了第2474（2019）号决议，但目前联合国内部没有专门处理劫持人质这一明显违反国际法行为的具体职权。这一疏漏使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没有归口协调中心，得不到指引，也没有适当代表。正因如此，我们呼吁安理会和秘书长设立一个专门的联合国任务负责人、一名负责人质事务的特别代表或特使——类似于美国负责人质事务的总统特使——来负责监测第2474（2019）号决议的执行情况，处理与劫持人质有关的更广泛的违法和伤害行为。这样一个任务负责人将提供机构领导、协调国际反应，并确保安理会作出的承诺化作实际行动，为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救助和正义。

总而言之,我和我的妻子今天作为父母来到这里,就像地球上任何其他父母一样,就像今天在座的奥尔娜·诺伊特拉和罗南·诺伊特拉一样,他们的儿子奥马尔——与一位美国公民伊泰一样——被哈马斯扣押,也与艾瑞斯·温斯坦——同样被哈马斯扣押的美国公民朱迪·温斯坦和加德·温斯坦的女儿——一样。由于找不到更合适的专用词语,我们——美国人质的家人和加沙其他54名人质的家人——是一场持续了数十年的冲突的附带损害,这是我能想到的最贴切的描述。我们想让伊泰回来,他的身体状况——无论是什么——都丝毫不改变他是人质的事实。我请安理会思考一下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作用,他一再要求释放加沙所有人质——无论生死。自特朗普总统就职以来,世界各地已有46名美国公民获释,但他的工作与安全理事会的工作一样,尚未完成。我们以无法发声的死者名义,要求安理会立即执行第2474(2019)号决议,并对不遵守该决议的人进行制裁。

最后,鉴于目前正在多哈就加沙可能实现的停火进行谈判,我们也不能允许出现这样一种现实,即在最后一名人质,即第58名人质未获释的情况下——因为加沙仍有58名人质,无论他们已故还是还活着——联合国通过一项新的决议,宣布加沙暴力的结束。

我感谢各位成员的时间和关注,并请他们给予支持,使像我这样遭受这一悲惨命运的家庭,无论他们生活在何处,都能够了结这件事情,至少能够翻下人生的下一个悲伤篇章。正如我们587天来一直在说的那样,现在就把他们带回家。

主席(以英语发言):我感谢陈先生所作的通报。

我现在请希望发言的安理会成员发言。

谢伊女士(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哈立德·希阿里助理秘书长。我也感谢李成宜女士和鲁比·陈先生今天有勇气以如此令人信服的方式在安全理事会发言。

我代表美国人民,对陈家和李家遭受的损失表示哀悼。我向他们两家人表示诚挚慰问。我们还与世界各地遭受这种困境的家庭站在一起,他们不确定自己的亲人在哪里、是否还活着,也不知道能不能以体面的方式安葬他们的遗体。

将近六年前,安理会处理了这一不公正现象,在60多个会员国的支持下,通过了有史以来第一项关于武装冲突期间据报失踪人员的决议(第2474(2019)号决议)。安理会通过该决议,以一个声音敦促武装冲突各方搜寻据报失踪人员,并归还死者遗体。但是,自第2474(2019)号决议通过以来,武装冲突当事方在执行该决议方面的表现令人遗憾。失去亲人的家庭每天都感受到这种失败,他们感到家人的缺席和无法排解的悲痛。对他们来说,这种失败是持续的、明显的。今天,这种失败就摆在我们面前。

就在今天,我与利亚·戈尔丁博士见了面,她一直不懈地代表在冲突中失踪、被绑架者残酷关押作为谈判筹码的所有活着和死去的人发声,包括在安理会发声。戈尔丁博士特别为她的儿子哈达尔·戈尔丁中尉发声,他和另一名士兵奥伦·肖尔于2014年8月1日被哈马斯恐怖分子绑架并杀害。她说:

“正是这个机构促成了停火——哈达尔·戈尔丁在这项停火下被哈马斯囚禁十多年并杀害——但它尚未履行自己的责任，纠正随后的不公正现象，并执行第2474 (2019) 号决议，让哈达尔·戈尔丁回家。”

我们有机会纠正这些错误，给悲痛的家庭带来慰藉。安理会应毫不留情地审视未能追究哈马斯——一个残暴的恐怖主义组织——责任造成的影响。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日杀害了伊泰·陈和其他1200人，现在却不让他们的家人有机会安葬他们的遗体，得到一定程度的慰藉。我们呼吁哈马斯立即归还美国人伊泰·陈、加迪·哈盖、朱迪·温斯坦·哈盖和奥默·诺伊特拉以及所有其他被杀害或谋杀的人质的遗体——现在就将他们的遗体交还给他们的家人。让家属能够哀悼，应当让他们感到事情已经了结。值得庆幸的是，由于特朗普总统和其他人的努力，埃丹·亚历山大在被哈马斯囚禁583天后，已经返回家园。但是，美国不会对所有与家人分离的人质的困境保持沉默，在他们与亲人团聚之前，我们绝不会善罢甘休。我们再次要求哈马斯立即释放所有人质。哈马斯必须归还剩余的58名人质，包括那些在囚禁期间被残忍杀害的人。人们将根据我们为了让他们回家做了什么来评判安理会。我们肯定在推动安理会处理这一问题方面发挥关键作用的利亚·戈尔丁博士和建议今天举行本次会议的鲁比·陈，此外我还要再次感谢李女士以及所有被绑架者家属，他们继续代表他们的亲人以及所有与他们有着同样命运的人呐喊发声。

朝鲜战争被绑架者家属联盟以及类似组织在追究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侵权行为的责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世界上最专制的独裁国家之一。该国的人权状况令人遗憾。美国仍然致力于立即解决被绑架者、被拘留者和未遣返战俘的问题。负责任的安理会成员不应包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权不受审查，而应利用其影响力，将被绑架者或其遗体交还其家人。我们再次呼吁武装冲突各方交还伊泰·陈等受害者的遗体，并积极寻找据报失踪的人，我在这里要包括阿富汗的美国公民保罗·奥弗比以及叙利亚的美国公民奥斯汀·泰斯和马吉德·卡马尔马兹。我们对所有被错误拘留或扣为人质的美国国民的承诺反映在以罗伯特·莱文森命名的《莱文森法》中，他的家人等待他的遗体从伊朗回家已将近20年。美国将继续推动所有在国外被不公正关押的美国公民回家。

我们敦促所有会员国全面执行第2474 (2019) 号决议，结束哈马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以及继续藐视该决议的所有其他武装冲突当事方不受惩处的现象。

吴百纳女爵士 (联合王国) (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谨感谢通报人感人的有力证词，感谢他们不懈地倡导。

我谨谈三点。

第一，如我们听到的那样，冲突中失踪人员问题造成持久的灾难性影响，其家人被迫活在对亲人命运毫不知晓的状态中。如我们听到的那样，仅在2024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登记了5.6万起新的失踪人员案件。联合王国支持通过第2474 (2019) 号决议。该决议要求武装冲突各方帮助失散家庭团聚或重新建立联

系,收集和**保护**失踪人员信息,并将遗骸交还亲属。然而,在太多的情况下,这些要求没有得到遵循。如李女士明确指出的那样,几十年过去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至今仍未向被其绑架者的家人提供他们的信息。至关重要的是,各方和所有利益攸关方都应遵守第2474 (2019) 号决议和国际人道法的规定,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和相关行为体获取据报失踪人员和被拘留或被扣为人质者的信息。

第二,世界各地的冲突继续导致人们与亲人分离。这包括乌克兰——该国至今仍有数以千计的人下落不明,其中包括数万名被强行驱逐到俄罗斯的儿童。在叙利亚,仍有13万多人下落不明,我们欢迎叙利亚新政府承诺设立一个全国委员会,以查明他们的下落。

第三,我还要强调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所遭受的难以想象的苦难。安理会从前人质Eli Sharabi和Noa Argamani那里亲耳听到了他们所遭受的残忍的非人道待遇(见S/PV.9882和S/PV.9868)。哈马斯必须为其可鄙行径承担责任。我们欢迎Edan Alexander获释,他本周回到了家人身边。但是,如我们今天从陈先生那里听到的那样,还有许多家庭仍在痛苦地等待。这也包括与英国有着密切联系的Avinatan Or, Yossi Sharabi和Shay Levinson的家人。

在加沙实现停火是让人质回家,结束巴勒斯坦人的苦难,恢复急需的和平的最佳途径。太多的人失去了生命,太多的人与家人分离。任何人,无论是在加沙还是在世界其他地方,都不应遭受这种命运。

为了所有至今仍未下落不明的人,现在是实现第2474 (2019) 号决议精神的时候了。

兰迪女士(丹麦)(以英语发言):首先,我要感谢希阿里助理秘书长的通报,感谢鲁比·陈先生和李成义女士令人心碎的有力证词。丹麦同情全球各地每一个仍在哀悼或寻找在冲突中失踪的亲人的人。

在被哈马斯囚禁19个月后,以色列裔美国人质Edan Alexander于本周早些时候获释。我们向Edan及其家人表示衷心的祝愿,并紧急呼吁继续保持这一积极势头。

我们继续谴责哈马斯2023年10月7日的野蛮恐怖袭击及其冷血的劫持人质行为。必须释放仍被扣押在加沙的剩余人质。必须结束人质及其家人的痛苦,也必须结束加沙200多万平民的苦难,这些平民极有可能陷入饥荒。以色列对加沙的人道主义封锁必须解除。我们还强调,必须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探视人质。这一点同样适用于未经指控而被关押在以色列行政拘留中心的人。

截至2024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追踪的全球失踪人员未结案件涉及25.5万多名失踪人员。从乌克兰和伊拉克到南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失踪人员数字令人震惊,不可接受。

如我们从今天李成义女士的个人证词中听到的那样,70多年前,有数十万士兵和平民在朝鲜战争中丧生或失踪。这导致了几十年来困扰几代韩国人的痛苦和创伤。在安葬家人时,整个家庭仍无法得到解脱或慰藉。

在叙利亚,我们都目睹了令人痛心的下落不明者、失踪者和被任意拘留者危机。冲突持续了14年,直到2024年12月阿萨德政权倒台才结束。其间,超过15万人被该政权部队和列入名单的恐怖组织绑架、拘留或强迫失踪。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失踪人员问题独立机构的成立是确定叙利亚所有失踪人员的命运和下落,以及为受害者及其家属提供支持的重要一步。

在乌克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登记的与失踪人员有关的未决案件数量惊人。乌克兰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也记录了俄罗斯军方在通报乌克兰失踪人员的命运或下落方面的一种系统性失误模式。这令人深感不安。丹麦明确谴责这些行为,特别是强行驱逐儿童,使数十万家庭处于痛苦的煎熬和绝望之中。

请允许我简要地谈三点。

如第2474 (2019) 号决议所述,军事规划人员必须将失踪人员、战俘和死者的管理纳入每一次作战行动。这包括有系统地对被拘留者进行登记,与家属迅速交流信息,以及有尊严地处理和鉴定遗骸。

我们重申,联合国工作人员、人道主义和医务工作者以及记者享有武装冲突法规定的特殊保护。他们在工作过程中被拘留或失踪,也会使社区感到恐惧,并摧毁一个又一个家庭。

最后,在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80周年之际,我们不禁想起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寻找战争期间与家人失散者并帮助他们团聚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安理会在第2474 (2019) 号决议中重申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保护冲突中失踪人员和被任意拘留者所做工作及所起作用的至关重要性。因此,第2474 (2019) 号决议是保护平民议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当前和未来的冲突环境中忠实执行第2474 (2019) 号决议,有助于缓解陷入冲突中的家庭、囚犯和平民的痛苦,在战争造成的混乱和苦难中带来一丝尊严和希望。

耿爽先生(中国):失踪人员问题是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安理会于2019年一致通过了2474 (2019) 号决议,重申对国际人道法的坚定承诺,就预防和解决失踪人员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

近年来,国际局势加剧动荡,地缘冲突不断上升。根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数据,2024年全球新增失踪人员超过5.6万人,创下了20年来最高增幅,2474号决议未得到有效落实。在加沙,以色列的进攻和围困已长达19个月,5万多巴勒斯坦人被夺去生命,不断发现的乱葬坑骇人听闻,还有不知道多少无辜的平民被掩埋在瓦砾之下。在苏丹,武装冲突已经导致1160万人流离失所,仅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登记的失踪人员就超过7700人。在南苏丹,近百名人道工作人员遇难,数十名人道工作人员至今下落不明。在海地,黑帮暴力愈演愈烈,平民特别是妇女、儿童失踪的报道也屡见不鲜。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和数字背后,是一个又一个伤心的故事,一个又一个破碎的家庭。有数十年追寻丈夫下落的妻子,有在废墟中徒手挖掘

子女的母亲。国际社会应当帮助有关国家解决失踪人员问题，努力让每一个因冲突而受伤的家庭找到答案、寻得慰藉。

我讲三点。

第一，解决失踪人员问题，应该以国际人道法为依据。任何针对平民和人道工作人员的袭击都不可接受。冲突各方有责任寻找失踪人员，收集、保护、管理有关资料，向家属澄清下落，帮助离散家庭团聚。冲突各方应确保人道准入，向人道工作人员提供必要协助。

第二，解决失踪人员问题，应该着眼于预防和消除冲突。只要战火还在燃烧，失踪人员的悲剧就可能重演。安理会要切实履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努力推动对话协商，和平解决争端，预防冲突发生。冲突各方有义务执行安理会决议，早日实现停火止战，通过政治谈判化解分歧，并最终消除冲突的根源。

第三，解决失踪人员问题，应该加大对当事国的协助。国际社会应当在尊重当事国主权的基础上，同当事国开展信息交流和经验分享，有针对性地帮助当事国加强能力建设，包括运用最新的科技手段搜寻、发现、识别失踪人员。中方支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等国际组织秉持中立、公正、独立的原则开展工作，为解决有关问题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推动落实安理会第2474号决议，为解决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问题作出不懈努力。

黄先生（大韩民国）（以英语发言）：我感谢美国、联合王国和法国代表团召集这次重要会议。我感谢希阿里助理秘书长的通报，并赞赏李成义女士和鲁比·陈先生提供的生动而深刻的证词。

我们刚刚听到了两次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的情况——一场久远的、发生在联合国成立后不久的战争，以及我们当下目睹的这场可怕冲突。然而，在这75年里，家庭的煎熬以及不知道亲人命运和下落对社会造成的心理影响依然如故。

去年，全世界失踪人数的增幅达到二十年来最高水平，新记录的案件超过56000起。这种前所未有的局面主要源于日益增多的武装冲突和无视国际法义务的普遍趋势。

最重要的是，必须遵守处理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的现有法律框架。一个防止武装冲突期间强迫失踪的一致法律框架已经到位。它牢牢植根于国际人道法、国际人权法和安理会相关决议，包括第2474（2019）号决议。尤其是，《日内瓦公约》为冲突各方规定了明确的义务：登记被拘留者和战俘，保存死者及其埋葬地点的记录，促进数据共享，这些都是防止家属忍受不确定性痛苦的重要措施。

尽管有这个无缝法律框架，但实地局势继续恶化。在叙利亚，估计仍有10万至20万人失踪。在苏丹，自2023年4月以来，报告了近1000起强迫失踪案件，不过实际数字据信要高得多。

在这样一个关键时刻，无所作为等于默许。安全理事会应继续一致发声，敦促武装冲突各方充分遵守法律义务。在这方面，我们再次强烈要求释放所有被哈马斯劫持的人质，并强调迫切需要澄清他们的命运。

为了有效应对失踪人员问题，应探索多层次的创新方法。所有当事国、武装冲突各方、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民间社会、媒体和私营部门应为此携手合作。在这方面，我们完全支持科威特和伊拉克当局在三方委员会框架内继续合作，搜寻、确认和归还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失踪的人员。

国际组织的支持也是不可或缺的。大会于2023年设立的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失踪人员问题独立机构反映了对一个中央机制的需求，它既要充当信息枢纽，也要充当受害者及其家属的联络点。

在国内，韩国人民知道由媒体带头发起的自愿举措会产生怎样戏剧性的结果。1983年，名为“寻找离散家庭”的电视节目在韩国直播了140天，结果获得了意想不到的巨大成功。这个节目使10000个自朝鲜战争以来失散的家庭重聚，他们甚至不知道亲人住在国内同一个地方。该电视节目后来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记忆名录。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在长达三年的冲突中，估计有10万平民被朝鲜绑架。根据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人权状况调查委员会2014年的报告，朝鲜当局在战时实行绑架十分普遍，目的是招募劳动力和专业人员。这构成大规模、有预谋的强迫平民失踪，根据国际法相当于危害人类罪。朝鲜不仅否认绑架事实，而且直到最近还继续绑架和拘留大量韩国人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其他国家公民。鉴于被绑架者及其家属年事已高，此事刻不容缓，不能再拖延下去。我国政府再次强烈敦促朝鲜解决与被绑架者、被拘留者和未被遣返的战俘有关的所有问题，包括正式道歉、核实受害者下落并确保立即让他们安全返回。

最后，我们应该记住，失踪人员问题的根本解决办法在于预防冲突与和平解决。因此，我们应该记住，今天因冲突而流离失所或成为难民的人，明天有可能成为失踪人员。因此，安理会现在应该设法负责任地处理这一重要问题。

莫斯科索先生（巴拿马）（以西班牙语发言）：巴拿马响应呼吁，参加本次关于第2474（2019）号决议执行情况的通报会，该决议是安理会专门处理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问题的第一项决议。我们也感谢各位通报人所作的令人动容的发言。我们与他们心系一处，支持他们走出悲痛。

今天，我们开会审议战争中与人相关的一个深刻问题：家属了解亲人命运的权利。这项权利没有时间限制，不取决于时间、地点或冲突类型。这是一项普遍权利。第2474（2019）号决议制定了一份明确的路线图：防止失踪，登记被拘留者，积极寻找失踪者，保护遗骸，并保证家属获得信息。这是一项法律义务，但除此之外更是一项道德义务。人员在武装冲突中失踪不仅给家庭留下深刻的伤痕，也撕裂了社会结构，破坏了持久和平的基础。这是一场悲剧，它使苦难长期延续，阻碍和解，破坏法治的全面恢复。

巴拿马强调,该决议必须以普遍、一致的方式得到落实。与寻找失踪人员有关的义务在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1977年和2005年分别通过的第二和第三《附加议定书》中作了明确规定。这些准则对各冲突的所有当事方都有约束力,无论冲突的性质和条款如何。这些准则没有时限,不能受政治或私人利益支配。所有当事方——无论是国家还是非国家当事方——都必须尽最大努力查明失踪人员的下落,并向家属提供适当的答复,即使在敌对行动停止很久之后也是如此。

在全球南方,长期冲突和军事入侵——无论是伪装成特殊行动还是正义事业——以及由外国资助的国内危机,都造成了一系列失踪和不确定性。从中东和非洲的战乱社区,到欧洲、中东以及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各国人民的战场,仍有数千个家庭承受着无法确知亲人下落的痛苦。寻找那些始终未归的人仍然是一个没有愈合的伤口,大声呼唤真相、正义和赔偿。受害者始终是那些人:农民、土著社区、老人、妇女和儿童。换言之,是那些并未拿起武器却承受着武装冲突最残酷重担的人。

巴拿马深知这种痛苦。我们历史上的伤痕,尤其是1989年12月20日军事入侵造成的伤痕,在我们的集体记忆中挥之不去,仍然引发不确定性和争议。据估计,有250至500人丧生,迄今仍有至少100人下落不明。这一现实迫使我们承认,人员在武装冲突中失踪不仅是一场人道主义悲剧,也是国际体系结构性不平等和地缘政治并非在所有情况下始终一贯适用其原则的症状。这种缺乏一贯性的情况必须结束。国际人道法的普遍性不能始终是一个未兑现的承诺。

因此,必须无一例外、不带条件地将寻找失踪人员置于和平进程、停火和所有冲突后重建工作的核心。政治意愿决不能仅限于声明或决议,而是必须转化为具体行动。寻找失踪人员不仅需要道德承诺,还需要充足的资源、专门的技术能力、适当的体制基础设施和长期持续的办法。国际合作对于确保各国、特别是资源有限的国家获得必要支持以开展体面挖掘、最先进的法医分析、准确识别人类遗骸并将这些遗骸体面地归还受影响家庭至关重要。

巴拿马认为,各国必须加强国家搜寻机制、促进相互合作并支持区域和国际努力,以保障家庭知晓亲人命运的权利。作为对保护人格尊严和知晓真相权的更广泛承诺的一部分,巴拿马也批准了国际人权体系的关键文书,包括《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和《美洲被强迫失踪人员公约》。尽管这些文书属于不同的法律制度,但它们补充了防止和消除一切形式失踪,包括武装冲突之外发生的失踪的努力。巴拿马也重申支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其公正和专业的工作对于寻找失踪人员、保护其家属和有效适用国际人道法至关重要。

第2474(2019)号决议是安理会在承认和解决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悲剧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但仅仅承认问题还不够。在该决议仍然有效的情况下,其他关键行动因否决权的使用而陷入瘫痪,从而使冲突长期持续,加剧了人类苦难,导致数千个家庭生活在不稳定之中,无法获知真相,伸张正义,也无法得到答案。巴拿马重申声援面临冲突的国家以及受失踪人员问题影响的社区。我们认为,只有通过立法、司法、人道主义和外交方面的一致努力,才有可能纪念受害者,防止新案件继续得不到解决。我们将继续支持尽一切努力,使家属获得及时答复的权利成

为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同时确保即使在武装冲突最黑暗的时刻，人格尊严也得到保护。

库德里先生（阿尔及利亚）（以阿拉伯语发言）：首先，我们谨衷心感谢哈立德·希阿里先生的宝贵通报。我们也认真听取了两位民间社会代表所作的通报以及他们关于失踪问题的经验。

每位失踪者都有一个故事，每个故事都是由忍受丧亲苦难与离别之痛的家人眼含热泪讲述的。这是一场悲剧——继续在期盼中饱受煎熬的悲痛的母亲、父亲、儿子和女儿讲述着这场悲剧。这是一出理应得到我们同情的人间悲剧，它使我们想起我们开国元勋们的远见卓识，他们在两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创建了联合国，为的是子孙后代不会继承战争的祸患与仇恨。现在，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是否依然忠于那些曾梦想和平的人的愿景。作为这些原则的继承者，我们是否有能力打破残酷的战争循环？联合国、尤其是安全理事会是否有能力承担起赋予我们的责任？如果我们无法捍卫人类的尊严——这是所有权利的前提——那么联合国就只不过是一句口号。

国际人道法规划了路线图。国际法、无论是《日内瓦四公约》还是对各方具有约束力的安全理事会各项决议，包括姊妹国家科威特国提出的第2474（2019）号决议，全面处理了失踪人员命运的各个层面，还有去年阿尔及利亚提出的主席声明（S/PRST/2024/4）。尽管如此，失踪人员仍在继续增加，仿佛我们并没有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仅在2024年一年，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就记录了120多起冲突中新增的56000多起失踪人员案例——这代表了56000个痛苦的故事，56000个在天堂与地狱之间饱受煎熬的梦想。这些数字代表了那些靠着一线希望——希望亲人终有一天能够回家——而活下来的家庭。当我们无视法律而且这种无视成为常态时，悲剧就变得司空见惯，生命损失就变成政策。我们再次呼吁建立明确、坚实和透明的机制，以确保全面遵守国际人道法，追究所有违法者的责任。这不是可有可无的选择，而是一种义务。任何人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任何人不能逃脱问责。

我们呼吁妥善记录被剥夺自由者的姓名，并告知家人其命运。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任务授权必须受到尊重，以便它能够妥善发挥其监测作用，从而确保被拘留者受到人道的待遇并且被准许与家人联络。武装冲突各方必须记录受其监管人员的信息，并且向敌方转递这些信息。各方必须搜寻和回收遇难者的遗体，有尊严地对待它们，并且记录一切现有信息，以便确认死者身份并将其遗体返还家人。

痛苦绝不能制造更多痛苦。苦难不是增加苦难的理由。去年据报失踪的56000人中，有11000人在加沙。他们在加沙——一片狭小的土地，却承受着巨大的苦难。仅加沙就承受了全世界一年中五分之一的苦难。那些在这个数字中看不到求助呼声的人已经丧失了人性。任何企图为在这块国际法缺失的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开脱的行为都必须受到谴责。巴勒斯坦人民普遍经受的苦难、尤其是他们遭受的损失并非始于2023年10月7日。它始于占领的开始，这种占领继续在侵害巴勒斯坦人——无论生死。他们在占领国的监狱里失踪。他们失踪是因为占领国继续把他们扣为人质。他们的家人被拒绝收回亲人的遗体，被剥夺最后告别和按照各种法律和教规体面地安葬他们的机会。

据收回烈士遗体全国运动称, 占领当局扣留了仅2024年一年被杀的198名巴勒斯坦人的遗体。这个数字不包括加沙地带, 使被以色列扣留的遗体达到641具。这种事态是不能接受的, 但是不幸的是, 它却是合法的, 因为以色列最高法院于2019年9月裁定, 允许以色列军事指挥官扣留和暂时埋葬被以色列军队杀害的巴勒斯坦人的遗体, 以期日后把它作为谈判的筹码。任何采取这种政策的人没有权利说教、训诫他人或者扮演受害者。

丧亲之痛是无法抹去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 它阻碍和平, 加深敌对。在一片充满苦难、遍地坟墓的土地上, 是无法培育信任的。因此, 遵守法律是保持我们人性的一个先决条件。我们所有人都梦想的和平或许是永远避免战争及其后果的最恰当的方式。

博纳方先生(法国) (以法语发言): 我谨感谢助理秘书长希阿里先生的通报。我也谨感谢并赞扬李成义女士和鲁比·陈先生及其家人。我赞扬他们的勇气和证言, 并要告诉他们, 围坐在这张桌子四周开会的有母亲、父亲、兄弟姐妹, 我们对他们所经受的苦难感同身受, 我们与他们站在一起。

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赋予我们责任, 在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的家人和亲人的痛苦也让我们义不容辞, 无论这些失踪人员是在战场上丧生、被劫持为人质、被迫失踪, 还是姓名未做记录的战俘。这种道义和法律上的双重义务促使安理会于六年前一致通过第2474(2019)号决议——首项专门处理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问题的决议。我同意Chen先生的观点, 安理会必须采取行动, 更好地执行该决议。

第一, 安全理事会必须继续要求冲突各方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 防止在武装冲突之前、期间和之后发生失踪事件。这些义务是无条件的, 不受对等原则的约束。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加沙, 自2023年10月7日以来, 法国一直呼吁立即无条件释放被哈马斯和其他恐怖团体扣押的所有人质, 包括我国的八名同胞。据以色列军方称, 仍有57名人质被扣押在该飞地, 其中34人已被宣告死亡。必须尽一切努力促成人质获释和遗骸返还, 而每个人都知道实现停火和恢复人道主义援助与和平谈判是多么紧迫。这些义务也适用于俄罗斯在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据乌克兰当局表示, 数千乌克兰家庭正在等待有关亲人的生死下落, 据信有2万名儿童被递解至俄罗斯。

解决失踪人员问题对于巩固和平也很重要。我们想到的是科威特和阿根廷, 那里数千家庭仍在等待有关失踪亲属生死下落的消息——这种等待已经持续了几十年。联合国绝不能不关心他们的生死下落。同样情况的还有叙利亚, 我们呼吁为自2011年以来失踪的13万多人寻求真相和正义。该国要想重建, 就必须做到这一点。在这方面, 我们欢迎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失踪人员问题独立机构、叙利亚民间社会组织和联合国其他调查机制, 包括协助调查和起诉自2011年3月以来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犯下国际法所规定最严重罪行者的国际公正独立机制以及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问题独立国际调查委员会所开展的工作。我们支持叙利亚新当局与这些机制之间的合作。

第二, 安理会必须重申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发挥的中心作用, 它的授权来自《日内瓦四公约》。冲突当事方必须与红十字委员会, 特别是其中央

寻人局合作,并向其提供信息渠道以及探访拘留场所和接触受保护人员的机会。法国支持红十字委员会在和平谈判和协议框架内促进建立信任措施方面发挥作用。我们还重申,我们支持受害者协会和人权倡导者,他们的作用不同于红十字委员会,却又是对红十字委员会的补充。

第三,国际社会必须立足于人权来打击强迫失踪责任人有罪不罚现象,这将在国际人道法之外提供额外保护。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如果强迫失踪的实施是作为大规模或有系统地攻击平民的一部分且为明知故犯,则构成危害人类罪。如果发生此类罪行,安理会仍可向国际刑院提交案件。法国还回顾《保护所有人免遭强迫失踪国际公约》发挥的核心作用,并呼吁所有尚未批准这项重要公约的国家批准这项公约。

即使是战争也有法则。安理会必须采取行动,确保它们得到尊重。法国在这方面作出了承诺并下定了决心。

托塔恩吉先生(塞拉利昂)(以英语发言):塞拉利昂感谢主席国应联合国、美国和法国请求召开本次重要会议。我们还感谢助理秘书长哈立德·希阿里发人深省的通报,我们注意到李成义女士和鲁比·陈先生分享的证词。我们心系他们和他们的亲人。

塞拉利昂对全世界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人数不断增加深感关切,据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委员会)报告,而且如秘书长报告所突出强调的那样,失踪案件现已逾25.4万。这不仅仅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更是一个深重的人类悲剧。成千上万的人推定死亡或被迫失踪。这些失踪事件往往是由绑架、法外处决和强迫迁移造成的。许多受害者仍然身份不明,而受害者家属不得不寻找答案和了解,有的已找了几十年。根据红十字委员会的数据,正在开展的失踪人员调查数量已达到惊人水平——仅在叙利亚就有13万多人,在黎巴嫩有1.7万多人,在非洲、东南亚、拉丁美洲和东欧还有数千人。例如,在乌克兰,失踪人数大幅上升,包括被迫与家人分离的儿童。

塞拉利昂强调,必须加强努力,寻查失踪人员踪迹,伸张正义,恢复家属了解亲人命运的权利。我们支持为解决这一问题而建立的机制,如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境内失踪人员问题独立机构,我们呼吁加强与红十字委员会和类似人道主义组织的合作。我们还着重指出因伊拉克1990年入侵和占领科威特而造成的长期失踪人员问题,这仍是一个未决人道主义问题。尽管取得了进展,仍有许多科威特国民和第三国国民的生死下落不明。我们回顾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其中概述了伊拉克有责任在查明失踪人员位置方面给予配合。塞拉利昂与其他方面一道呼吁继续努力,根据国际人道法和安全理事会决定履行这些义务。

失踪人员家属的焦虑、恐惧、无助和痛苦会使创伤代代相传,助长暴力和不信任的循环。这种动态发展阻碍和解与建设和平。和平谈判与过渡时期司法进程必须明确纳入解决失踪人员问题的措施,包括真相调查、受害者支助和纪念举措。第2474(2019)号决议是一个里程碑,确立了冲突当事方防止失踪、寻查失踪人员踪迹和促成遗骸归还的明确义务。它申明,保护平民和尊重人权并非可有可无,而

是国际法规定的基本义务。塞拉利昂支持该决议规定的切实措施，例如妥善登记被拘留者、建立国家信息局以及对武装部队进行遵守国际人道法的培训。

失踪人员问题对于儿童的影响尤其严重，他们很容易流离失所、被招募、被剥削、与家人分离。冲突的混乱阻碍追寻失踪儿童踪迹，阻碍其与家人团聚，使家庭长期处于痛苦之中。妇女和女孩也受到格外严重的影响——往往是性暴力、贩运和强迫婚姻的受害者。许多人都是在这几种情况下失踪，进一步加深了受影响社区的创伤和不稳定。

塞拉利昂始终致力于全面执行第2474 (2019) 号决议、大会两年期决议 (第77/220号决议) 以及预防和解决冲突中失踪人员案件的广泛努力。我们主张加强合作框架，并提议建立一个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全球数据库。该倡议将促进信息及时共享和跨境合作，以实现家庭团聚和正义。此外，我们支持制定并通过失踪人员案件报告和调查标准化国际规程。这些议定书将统一程序，提高搜寻和识别身份工作的效力。

我们还强调，必须开展国际合作，解决冲突、贫穷、贩运人口和流离失所等根源问题。在这方面，我们强调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委员会2021年通过的关于非洲失踪移民和难民的决议，该决议呼吁保护家属的权利，并建立预防和问责法律框架。

每一个失踪者背后都有一个故事——等待消息的家庭，被打乱的社区，被中断的未来。国际社会不应放松努力，以便给受影响者带来回答、尊严和正义。

塞拉利昂重申，我们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国际人道法、促进究责和推进多边合作，以解决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的困境。

易卜拉欣先生 (索马里) (以英语发言)：首先，请允许我感谢哈立德·希阿里助理秘书长今天所作的通报。我们也注意到并认真听取了李女士和陈先生介绍的情况。

武装冲突中的失踪人员问题是一个深层次的人道主义问题，对个人、家庭和社区产生深远和持久的影响。尽管冲突历来都对平民造成伤害，但这种伤害是不可接受的。在这方面，我国代表团愿根据第2474 (2019) 号决议所载原则，强调几个相关问题。

第一，我们强调，防止人员因武装冲突而失踪并解决根源问题至关重要。正如第2474 (2019) 号决议所强调的那样，武装冲突各方负有采取一切可行步骤确保保护平民和防止失踪事件的首要责任。

第二，制定和维护国家法律，同时履行相关国际人道主义文书规定的责任，至关重要。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1977年《附加议定书》是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法律框架的关键组成部分。武装冲突各方必须承担首要责任，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来确保保护平民，包括减少失踪人员事件的数量。

第三，加强国际合作与支持是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分享信息和专业知识至关重要。这种支持与合作应符合冲突中国家的需要，并根据它们的请求予以提供。我们欢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红十字委员会) 及其中央寻人局在协助搜寻失

踪人员和支持受影响家庭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正如我们今天所了解到的,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2024年登记了56559起新的失踪人员案件, 并正在追踪254000多起案件。这些数字令人震惊。我们鼓励各国继续在这方面与红十字委员会合作并给予支持。

根据集体经验, 我们强调真相、正义、和解和究责在巩固和平和实现可持续和平方面的重要作用。

最后, 失踪人员及其家属的困境是超越国界, 并且触及我们所有人的人道主义挑战。维护受影响者的尊严和权利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我国代表团重申支持第2474 (2019) 号决议的目标, 我们呼吁各方履行义务, 将人道放在其行动的中心。

扎博洛茨卡亚女士 (俄罗斯联邦) (以俄语发言): 我们注意到各位通报人对今天讨论所作的贡献。

俄罗斯支持所有协助寻找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的努力, 包括第2474 (2019) 号决议。因战争而失散的人应当能够了解其亲人的命运, 如果这些亲人还活着, 应当能够与他们团聚。各国在这方面的义务载于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及其各项《附加议定书》。

俄罗斯是受失踪人员问题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仍有数百万苏联公民下落不明, 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帮助下, 为寻找他们做出了巨大努力。然而, 这一问题从未成为安理会审议的议题。

我们认为, 安理会讨论70年前朝鲜战争后果的某些方面无助于解决朝鲜半岛当前的局势。该地区的主要不稳定因素仍然是北约国家在亚太区域不断增强军事存在, 正在有系统地破坏独立于联盟的集体安全架构的前景。

寻找失踪人员首先是一个人道主义问题, 对冲突幸存者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与此同时, 与任何其他人道主义活动一样, 寻找失踪人员工作需要与受影响国家协调进行, 补充它们的努力。我们必须发展实质性合作, 向各国政府提供有效援助。国际社会拥有这样做的手段。

在这方面, 人道主义组织, 包括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有关的组织, 可以与来自各国的中立调解人一道发挥重要作用。我们必须认识到, 在没有过度政治关注的情况下, 处理这些问题要容易得多。不幸的是, 国际议程政治化的普遍趋势也影响到人道主义领域。就连像寻找失踪人员这样重要的问题也成为施加政治压力的工具。我们还看到如何以方便的借口向各国强加假援助。这种做法适得其反, 导致人道主义合作减少。在这方面, 我们看到设立了一些与失踪人员问题有关的机构, 这些机构被用作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

就俄罗斯而言, 我们正在尽一切努力寻找失踪人员, 并在乌克兰危机的背景下重建家庭联系。我们感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协助确保在这方面交流信息, 并就遣返平民问题进行调解。俄罗斯联邦人权专员塔蒂亚娜·莫斯卡尔科娃和总统儿童权利专员玛丽亚·利沃娃-贝洛娃以及俄罗斯红十字会都非常密切地参与了与委员会的信息交流。

我们要表示遗憾的是，哈立德·希阿里助理秘书长今天决定重复来自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报告的不实说法。该办事处的报告完全由基辅当局控制。因此，它无法提供任何客观信息。与此同时，令人遗憾的是，希阿里先生甚至没有提及还有俄罗斯国籍的失踪人员，可悲的是，这可以被视为双重标准的例子。

我们还注意到，联合王国代表团反复提及约有2万名儿童被绑架。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同样的数字，却没有任何细节、证据或信息来予以证实。与此同时，没有人提到库尔斯克州约有2000名平民因乌克兰武装部队的入侵而失踪的事实。我们在3月份解放该地区部分领土时发现了378人，目前正在进行进一步搜寻。我们知道，其中一些人被基辅当局扣押作为人质和交换的筹码，基辅当局自己也公开承认这一点。

我们对美籍以色列人质Edan Alexander的获释和此前哈马斯释放的所有其他人质的获释表示欢迎。我们希望这一姿态将有助于哈马斯和以色列在埃及、卡塔尔和美国的调解下迅速达成协议。

最后，我们谨赞扬为搜寻世界各地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所做的一切努力。然而，我们并不认为安全理事会是处理这些问题的最佳场所，特别是考虑到它们的历史背景。

罗德里格斯-伯基特夫人（圭亚那）（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希阿里助理秘书长富有见地的通报及其对武装冲突期间据报失踪人员问题的清醒评估。我也感谢李成义女士和鲁比·陈先生作为有亲人被绑架的家庭成员提供证词。我们对他们不得不忍受这些艰难的经历表示同情。

武装冲突最严重的后果之一是平民和战斗人员一直下落不明。

近六年前，安全理事会认识到应对这一挑战的紧迫性日益增加，一致通过了第2474（2019）号决议。作为对这一重要步骤的补充，安理会去年就失踪人员问题通过了一项由阿尔及利亚、圭亚那、塞拉利昂和莫桑比克牵头提出的主席声明（S/PRST/2024/4）。尽管这些成果丰富了关于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和强迫失踪问题的国际法律框架，但安理会有义务继续关注这一关键问题，因为它仍然是武装冲突中一个长期存在且普遍的特征。

请允许我回顾秘书长2024年关于保护平民的报告（S/2024/385），从中我们获悉，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2023年登记了4万起新增失踪人员案件。这是当时记录在案的失踪人员案件最高年度登记数据。遗憾的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表示，这一前所未有的增长仍在继续。如前所述，该组织在2024年登记了5.6万例新病例。应当强调，这些是已持续数十年之久的冲突遗留的未决案件之外的新增案件。

有鉴于此，圭亚那将继续将第2474（2019）号决议视为国际社会努力解决失踪人员问题的重要工具。该决议提供了一套重要的指导方针，各国可以而且应该利用这些指导方针来建立综合性国家框架，以防止失踪，查明失踪人员身份，制定措施积极寻找遗骸，并将找到的遗骸归还给家人。至关重要的是，该决议还呼吁武装冲突各方确保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能获得相关信息，并与它进行合作，以解决失

踪人员问题。我们赞同这一呼吁，并表示支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为履行其职责所做的努力。

各国有义务在武装冲突期间优先保障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的安全，这是为防止发生人员失踪事件所能采取的最有效步骤。有效的预警系统对于推进此类努力至关重要。各国还应建立适当机制，使失踪人员家属能够登记案件，并建立数据库，为今后的搜寻和找回工作提供线索。

在寻求公正持久和平的过程中，失踪人员案件绝不能不了了之。在这方面，圭亚那着重提及在以巴冲突以及乌克兰、缅甸、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国境内的战争等仍在持续的冲突中发生的失踪人员事件。我们继续谴责在这些和所有武装冲突中非法拘留人员的行为，并强调冲突各方有义务通过红十字国际委员的探视等方式确保他们在被拘留期间的福祉。被拘留者的家人有权获知其亲人的信息。

我们对冲突中被拘留者遭虐待案件尤为震惊，并要以最强烈的言辞谴责此类行为。冲突中失踪人员最终状况的不确定性迟迟得不到消除，可能会使前冲突各方之间的不信任感持久化，破坏随后的和平努力，这是一个不可否认的风险。因此，我们鼓励和平调解人在解决冲突进程中将这一问题置于优先位置。

最后，圭亚那再次呼吁各国制定和执行国家和区域机制，紧急、高效处理武装冲突造成的人员失踪问题。对于战争幸存者来说，虽然身体上的伤疤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愈合，但如果不能确定所爱之人的命运，心灵无法得到慰藉，看不见的情感伤疤就无法开始愈合。和解是可持续和平的一个关键要素，如果冲突各方不表现出以重视真相和问责的方式解决任何失踪人员事件的决心，和解就无法充分实现。

尤雷科女士（斯洛文尼亚）（以英语发言）：我谨感谢希阿里助理秘书长、李女士和陈先生所作的通报。我感谢李女士和陈先生勇敢地提供证词。他们令人痛心的叙述突出表明，安全理事会也需要处理失踪人员问题。我谨向李女士和陈先生表示慰问。

我也谨借此机会欢迎美国人质Edan Alexander获释。斯洛文尼亚再次呼吁释放仍关押在加沙的所有剩余人质，并允许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人质获释前能不受限制地探视。

去年失踪人数创下新高，达5.6多万人，超过了前年创下的记录。这一可怕的数字是世界上冲突数量空前，同时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继续遭公然违反和无视的结果之一。我们不应该把它仅仅看作是统计数据。对于成千上万的受害者及其家人来说，这是真实的生活，他们有时在武装冲突结束几十年后仍在寻找亲人。

我来自一个在本区域目睹了这点的国家。前南斯拉夫各国境内的战争在几十年前就结束了，但人们至今仍深切感受到战争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武装冲突期间失踪的4万多人中，仍有约1万人下落不明。有些母亲仍在寻找自己的孩子，有些妻子仍在为丈夫和儿子准备晚餐，以防他们回来。有些家庭查明亲人命运真相

的艰辛之旅仍在继续，而这种漫长的寻找对他们自身创伤的愈合、国家间关系的缓和以及本区域急需的和解是有影响的。

因此，解决失踪人员问题不仅是一项道义责任，而且是确保本区域持久和平与稳定的基石。有鉴于此，我要强调柏林进程等倡议，特别是失踪人员问题工作组工作的重要性。我还要提及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这方面提供的协助及作出的贡献，其价值不可估量。

开展区域合作，作出新的政治承诺，对于取得进展至关重要。我们期待着积极参加即将于今年晚些时候在伦敦举行的柏林进程首脑会议。

我们认为，这次辩论会和任何涉及国际人道法的辩论会都是非常必要的。

国际人道法规则保护平民，保护失踪者及其家人。各国和冲突各方必须查明失踪人员的下落，并调查和起诉造成人员失踪的罪行。这是第2474（2019）号决议重申的道义责任和法律义务。

我们发誓绝不允许再次发生的恐怖事件每天都在我们眼前重演。

乌克兰、叙利亚、苏丹和加沙地带持续不断的冲突导致数万人失踪，人质仍被扣押，数千名巴勒斯坦人失踪——许多人被埋在废墟之下，一些则被葬在万人坑中。

冲突和战争早已结束，但哥伦比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科索沃和伊拉克仍有数千人失踪。

我们再次呼吁所有国家和冲突各方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尊重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规则。我们呼吁加强追究责任以及坚定致力于遏制有罪不罚现象，包括通过与国际刑事法院合作。我们呼吁各国在寻找失踪人员方面加强合作并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合作。

最后，我们呼吁遵守并全面执行第2474（2019）号决议。

艾哈迈德先生（巴基斯坦）（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我感谢你召开本次重要通报会，讨论涉及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这一关键问题的第2474（2019）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我还要感谢各位通报人的宝贵见解。

关于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的第2474（2019）号决议体现了我们对一项基本原则的共同承诺：即使在战争的混乱中，也必须彰显人道精神。它庄严地承认了无数家庭仍在等待亲人归来的痛苦和苦难。然而，尽管有这种集体意愿，失踪人员的悲剧仍在继续。这是一场无声的危机，困扰着身处所有冲突局势的民众。

第2474（2019）号决议旨在防止冲突中人员失踪，查明失踪人员的命运，并确保其家人的权利得到保护。该决议还重申了武装冲突各方根据国际人道法所承担的责任。

冲突地区和被占领土——从巴勒斯坦到被占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失踪人口问题尤为严重。失踪人口不仅仅是数字。他们是永远都未回家的父亲、与孩子失

散的母亲、在深夜失踪的年幼男孩，以及命运已被注定却不为人们所了解的女儿。他们的失踪是一道永难愈合的伤口，让家庭陷入希望与绝望的无尽循环。

失踪人员和强迫失踪是查谟和克什米尔近八十年冲突的一个严峻现实。近年来，在印度非法占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数千名遇难者没有标记、不为人知的坟墓浮出水面。调查显示，这些遇难者先是被印度占领军失踪，然后遭受酷刑致死或被即决处决。

据查谟和克什米尔民间社会联盟称，占领国继续否认印度非法占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存在数千名被迫和非自愿失踪人员，而且不愿对7000多个无标记的万人坑进行法医调查。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其2018年和2019年关于克什米尔的报告中建议对印度非法占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所有无标记的万人坑进行独立、公正和可信的调查。

尽管大家呼吁调查和追究责任，但在印度非法占领的查谟和克什米尔地区，失踪人员的悲惨处境仍在持续恶化。自2019年8月5日印度采取非法单方面行动以来，数千名男孩被绑架，许多人至今仍下落不明。最近在查谟和克什米尔发生的恐怖事件被用作借口，围捕了2000多人，目的是进一步压迫争取正当自决权的克什米尔人。

加沙仍在持续的悲剧凸显了武装冲突对失踪人员及其家人造成的毁灭性影响。自2023年10月以来，仍有1.4万多巴勒斯坦人下落不明——许多人被埋在被毁房屋的废墟之下，他们的声音被无休止的轰炸所压制。这种严峻局势要求我们采取紧急行动，确定每一位失踪人员的下落，使其与家人重建联系，维护在冲突混乱中失踪者的基本权利。

在世界各地无数其他武装冲突局势中，很多家庭仍在承受失踪亲人下落不明的痛苦。这些都是冲突和肆意逍遥法外现象造成的残酷后果。

请允许我谈谈几个要点。

首先，我们呼吁冲突各方严格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确保对违法行为追究责任。

其次，我们敦促所有会员国加强合作，包括通过司法协助和数据共享，以追踪和识别失踪人员。协调一致的国际努力对于应对这一挑战至关重要。

第三，必须确保人道主义援助准入。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内的人道主义组织必须获准在冲突地区自由开展工作，记录、追踪失踪人员并为他们及其家人提供支持。

最后，失踪人员的困境是冲突持续没有得到解决这一更大问题的表现，而冲突才是问题的根源。因此，预防冲突和解决争端对于解决失踪人员问题至关重要。可持续的和平与和解进程可以显著降低失踪风险。

我们必须始终牢记失踪人员问题所涉及的人道主义问题。我们必须共同努力，维护所有受冲突影响者的尊严和权利，确保失踪人员不被遗忘。加强国际合

作、有效履行国际法律义务以及加大人道工作力度，仍然是有效处理这一紧迫的人道主义问题的关键。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现在以希腊代表的身份发言。

首先，我要感谢希阿里助理秘书长的发言，并感谢我们的两位通报人李成义女士和陈先生震撼人心的证词。

再过几天，安全理事会将就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问题举行年度公开辩论会，我们认为今天的讨论非常及时。

于2019年获得一致通过的第2474 (2019) 号决议是我们共同努力处理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困境的里程碑；该决议特别强调，各国必须以全面、有效和可信的方式处理该问题。

然而，我们为达到这些标准所做出的集体努力似乎还不够。希腊对失踪人员不断增加深感担忧。这些案例不仅是统计数字，更是饱经苦难者的个人故事。

找到每一位失踪人员不仅是一项法律义务，更是一项道义责任，有助于减轻苦难、促进冲突和冲突后地区的和解与建设和平。

适用于国际性和非国际性武装冲突的习惯国际法规定，必须采取一切可行措施，查找武装冲突中据报失踪人员。同样，他们的家人理应知晓他们的命运。若失踪人员家属获得信息受阻，这就相当于不人道待遇。家属知晓失踪亲人命运的权利至关重要，这与冲突各方收集据报失踪人员信息的义务密切相关，同样也与他们处理死者遗体的义务相关。

我欢迎各位请求参加我们今天讨论、并将详述他们国家正在处理的案件的会员国代表。

原则上，希腊完全支持联合国的工作，特别是通过建立失踪人员委员会，这属于现有的国际做法。这样的委员会在追踪失踪人员下落方面的作用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们之所以关键，是因为它们向各方强调了彼此真诚合作以及与委员会合作的明确义务，因为这种合作对委员会的任务和成功至关重要。

关键在于，国际社会在一些情况下不能忽视这一事实，例如在科威特、叙利亚、乌克兰或巴勒斯坦被占领土——2023年10月7日发生的骇人恐怖袭击以及随后在加沙地带的大规模敌对行动导致双方都没能幸免于难。

我要特别提及第2723 (2024) 号决议中重申的塞浦路斯失踪人员委员会，该决议赞扬该委员会当前的工作，这些工作应该得到支持，从而终结失踪人员家属的痛苦。

我也借此机会赞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重要作用，并表示支持其中央寻人局的工作，它努力寻找和确认失踪人员，防止与亲人失联，支持家庭并恢复家庭联系。

为了使第2474 (2019) 号决议产生切实影响，必须通过优先关注某些领域来加强政治意愿。我们尤其应该优先考虑登记、身份查验和促进家庭团聚。同样，我

们必须通过建立关于最佳做法的数据收集和信息共享系统,表明尊重家庭知晓据报在武装冲突中失踪的亲属、特别是据报失踪儿童的权利。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利用新兴技术,加倍努力,采取以受害者为中心的方法,尽心尽力提供必要的社会心理和经济支持。

最后,执行第2474(2019)号决议对于减轻武装冲突的严重人道主义后果至关重要。我们在集体努力执行该决议的过程中,绝不能忽视人权部分,它与国际人道法的人权部分是一致的。在动荡变乱加剧的时代,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维护我们共同的人性。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职能。

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达农先生(以色列)(以英语发言):我感谢希阿里助理秘书长和李成义女士所作通报。我也感谢鲁比·陈先生直击人心的通报。

我想说,鲁比今天本不必来到这里,我不是以一名外交官的身份,而是作为一名父亲、一名丈夫和一个人说出这句话。他原本不必坐在安理会面前解释他的儿子如何被谋杀、尸体如何被带走,他自己又是如何被蒙在鼓里长达数月。但他来了。他带着尊严和勇气,带着一种出人意料的力量来到这里。在伊泰的遗体被交还之前,我们不会止步。这是我们最神圣的义务,因为带我们的儿子回家是我们的本能。

来到我们中间的还有利亚和梅纳赫姆·戈尔丁,分别是哈达尔·戈尔丁的母亲和兄弟。2014年,在联合国和美国斡旋的停火期间,哈达尔·戈尔丁被杀害,尸体被劫走。停火是为了促成交战中的人道主义暂停。 Hamas反而利用停火来伏击哈达尔,杀害了他并盗走他的尸体。将近11年过去了,11年来,问题没有得到解答,11年来,一家人不能埋葬儿子。他的母亲利亚成为了象征勇气和道德清明的光辉。当那么多人保持沉默时,她大声疾呼。她成为了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社会许多其他机构未能找到的良知。当国际社会未能采取行动时,利亚拒绝默默坐视。我们感谢她,并将重复她的呼吁——把哈达尔带回家。

今天和我们一起来到这个会议厅的还有奥马尔的父母奥纳和罗南·诺尔特拉。奥马尔是一名21岁的以色列裔美国人,他是纽约长岛引以为傲的儿子。他于2023年10月7日在哈马斯的野蛮袭击中丧生。他的尸体也被带到加沙,至今仍被哈马斯扣留。一年多来,奥纳和罗南生活在痛苦的不确定中,希望他们的儿子还活着。他们不知疲倦的宣传使他的故事受到公众关注。他们谈到了奥马尔对体育的热爱,特别是足球、篮球和排球。奥马尔是一个热情体贴的年轻人,他一走进任何房间,都会热闹起来。奥马尔的故事是对哈马斯卑鄙策略的明确警示,这剥夺了家人哀悼和埋葬亲人的基本尊严。我们与诺尔特拉一家人同在。

在我们谈论国际法之前,我们必须谈一些更基本、更古老、更人道的东西——让死者回家的道德义务。这不是政治原则。这不是西方标准。这是每个国家共同的普世要务,根植于每一种宗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它们都把埋葬仪式视为神圣。埋葬死者,写下他们的名字,让他们的家人有尊严地哀悼——这

镌刻在每个人的良心中。哈马斯不仅以最令人作呕的方式违反了这一义务，还以此为基础打造了一门产业。他们偷走被害人的遗体，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他们在街头展示这些遗体。他们把遗体储藏在隧道里。他们用遗体来勒索、谈判、拖延和获利。他们不尊重死者。他们把死者当成库存。对他们来说，被谋杀的子女的遗骸与手中的现金没有什么不同。哈马斯创造了死亡经济。看看2023年10月7日的视频。他们在战斗中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搬运尸体，只不过，他们是在花力气将尸体强行带到加沙。这是系统性的，不是偶然；是一种策略，不是悲剧。

然而，安理会那么多国家，那么多正义国家，几乎一言不发。目前有58名人质被扣押在加沙——有些活着，有些已被杀害——所有人都被剥夺了权利，都禁止外界接触，都被剥夺了他们无疑应有的尊严。

正如我们今天听到的那样，安理会在2019年通过了第2474 (2019) 号决议。当时我在这里。它呼吁武装冲突中的所有各方说明失踪人员下落，归还死者遗体，提供信息，以便家属哀悼，并要认识到这些行为不是赏赐——这只是人类应该做的。

哈马斯一再公开违反该决议的每一个字。回应在哪里？要求履约的声音在哪里？最基本的道德义愤在哪里？哈马斯对该决议的亵渎及其代表的彻头彻尾的不人道无法用语言表达，而国际社会对此视而不见。

这不仅是对以色列的犯罪，也是对全世界的警告。如果这成为一种新常态，如果夺取尸体成为一种能被接受的成功策略，那么没有一个家庭、士兵和平民能够免遭同样的命运。今天是我们——我们在应对这个问题。明天可能轮到任何人。战场不会止于死亡。它会追随死者进到坟墓中。

我们要求安理会采取行动，而不是表示同情。我们呼吁秘书长履行第2474 (2019) 号决议规定的任务，在其下一份关于保护平民问题的报告中纳入专门章节。该章节必须全面记录这一正在发生的暴行：仍被哈马斯扣押的每一名人质、每一具被偷盗的遗体、自10月7日以来失踪的每一名以色列人以及过去战争中阵亡、遗体尚未归还的每一名士兵。我们支持陈先生呼吁任命一名联合国特别代表，负责促进和倡导已故人质——包括我国已逝的英雄和世界各地所有被剥夺和平的人——的归还工作。将我国人民送回故土的义务不会随着时间而消逝；它将一直持续到任务完成。

正如安理会成员所知，在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中，一名年轻女性为了埋葬她的兄弟而违抗国王的诏令。她知道代价，也知道后果。但她选择采取行动。她死去的兄弟依然是她的兄弟，他值得拥有尊严。这个故事发生在数千年前、不同的语言环境和截然不同的世界中。然而，它反映了我们今天请安理会铭记的同一普世真理：拒绝给予安葬权违反了比法律更深层次的东西；它违反了我們作为人类的本质。

我们自己也有一个类似的传统故事。以色列的第一位国王扫罗王在战场上阵亡后，敌人夺走了他的尸体，将其悬挂在城墙上。但他的追随者冒着生命危险，越过敌军防线，找回了他的尸体，并为他举行了体面的葬礼。他们明白，对待逝者的方式决定了我们生者是什么样的人，连安理会也常常忘记这一点。

古代以色列人做正确的事,不是因为别人让他们这样做,而是因为他们的良心要求他们这样做。安提戈涅埋葬了她的兄弟,因为这是正义的要求。今天,以色列国将继续本着同样的信念行事。我们不会忘记死者。我们不会抛弃他们。我们不会允许哈马斯将记忆变成武器。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将履行这一责任。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伊拉克代表发言。

马尔祖克先生 (伊拉克) (以阿拉伯语发言): 伊拉克代表团感谢并赞赏希腊作为安理会本月主席所作的努力,并赞扬法国代表团作为上月主席所作的努力。我们感谢哈立德·希阿里先生今天的通报。

我们重视安全理事会讨论这一崇高且重要的人道主义问题的努力,这一问题国际战争和冲突的遗留问题之一,即使是发生在很久以前的战争和冲突。我们认为,寻找失踪人员和确定其下落是一项集体人道主义责任,应通过相关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和机构开展国家和国际努力,根据合作和技术援助原则建立国际人道主义机制,以此取得成果,促使发现失踪人员的下落和遗骸。

我们赞扬安全理事会根据《联合国宪章》赋予的任务所承担的许多职责和任务,同时强调必须根据我们共同的集体责任,通过旨在弥合分歧和结束冲突的对话、协商和谈判消除冲突根源,实现可持续和平与安全。国际人道主义组织应处理并介入这些问题;为此需要在当地开展技术工作。

与其他受冲突和战争影响的国家一样,伊拉克也遭受了因我国前独裁政权发动的毫无意义的战争及我国反恐战争而导致的失踪人员数量不断增加的痛苦。伊拉克仍在不懈努力,争取确定因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军事行动而失踪的数千名伊拉克受害者的命运。母亲、妻子和孩子们仍在等待获知亲人和亲属的命运。我们借此机会感谢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团队——在发现和帮助确定失踪受害者命运方面经验最丰富、最权威、最专业的国际机构——努力在搜寻失踪人员过程中提供技术援助与合作。伊拉克对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的良好表现、其工作人员在当地的能力、在全球多地取得的具体成果以及与伊拉克团队的持续合作充满信心。伊拉克也正在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团队进行建设性合作,并强调,我国根据1949年《日内瓦四公约》并按照第2474 (2019) 号决议的规定,大力支持其他国际组织和机构为解决失踪人员问题所作的努力。

伊拉克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和优先性,重申充分致力于并随时准备与国际社会合作,通过以擅长处理失踪人员问题著称的国际专门机构,包括联合国,寻找有效解决办法,以应对这一问题的后果。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现在请塞浦路斯代表发言。

米凯尔女士 (塞浦路斯) (以英语发言): 首先,我谨感谢主席希腊组织本次会议,讨论这个具有深远人道主义和道德意义的问题,并感谢各位通报人所作的令人信服的发言。

第2474 (2019) 号决议——这是一项历史性决议,是安全理事会第一项专门处理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问题的决议——强调解决这个问题至关重要,不仅是一项人道主义义务,也是和解、冲突后恢复和持久和平的支柱。武装冲突中失踪人员

的困境超越国界、政治和意识形态。战乱中失踪人员的呼声及其家人的痛苦往往得不到倾听，他们的命运无人知晓。第2474 (2019) 号决议旨在改变这一现实，重申国际人道法的核心地位，特别是武装冲突各方的义务，即防止失踪、搜寻失踪人员和为获取信息提供便利。

无论决议的措辞多么有力，都需要采取具体行动，挑战依然艰巨。世界各地冲突激增，强迫失踪和失踪人员问题的规模令人震惊。缺乏政治意愿、人道主义准入受限以及将失踪用作战争工具，只是实现第2474 (2019) 号决议宗旨的工作所面临的部分障碍。因此，我们必须重申致力于执行该决议，加强国际合作，追究施害者责任，将受害者及其家属置于核心并投资于技术和数据共享。

塞浦路斯对失踪人员这一令人痛苦的遗留问题并不陌生，非常清楚必须加快切实执行安理会决议。塞浦路斯局势是一场持续了数十年的人道主义悲剧。20世纪60年代的族群间暴力、主要是1974年的土耳其非法军事入侵，导致2000多人失踪，其中包括希族塞人、土族塞人和那些派代表参加本次会议的国家的公民。至今仍有许多人下落不明。塞浦路斯的失踪人员中既有战斗人员，也有平民，其中包括老人、妇女和儿童。

国际人道法规定，冲突各方必须采取措施，查明因武装冲突而报告失踪的人员，并为其家属提供有关其下落的信息。就塞浦路斯而言，土耳其在非法入侵塞浦路斯岛国期间没有采取措施防止人员失踪，至今仍拒绝清点失踪人员和对其失踪进行调查，拒绝一视同仁地查明其命运或者为其家属提供有关其死亡情况的信息。值得注意的是，土耳其拒绝披露其军事档案中的相关信息，拒绝提供对可能的埋葬地点的充分和不受阻碍的准入，并且拒绝提供有关失踪人员遗体迁移的信息。

1981年，在联合国的主持和两族的合作下，成立了塞浦路斯失踪人员问题委员会，这是向前迈出的关键一步。迄今，委员会已挖掘、查明身份并且归还了1054具遗骸，为几十年来一直蒙在鼓里的许多家庭带来了答案。但是这项工作远未完成。数百人依然下落不明。随着时间流逝、目击证人去世和记忆消退，证据也面临永远灭失的风险。

除了支持失踪人员问题委员会的努力之外，1999年以来，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还一直在其有效控制区内落实挖掘和辨认失踪人员遗骸的方案。政府掌握的所有信息均已提交委员会。

土耳其急需采取并且保持一种主动的做法，为失踪人员问题委员会提供一切必要信息、援助以及合作，以便找到失踪人员和查明其身份，做法是确保对塞浦路斯被占领区各地、包括军事区的立即、无条件、不受阻碍和不间断准入，并为委员会提供其掌握的所有信息，尤其是其军事档案中的信息。请允许我们表明：时间的流逝绝不能成为不作为的借口。相反，它必须激发更大的紧迫感。

安理会早就承认解决塞浦路斯失踪人员问题的重要性，在其相关决议中经常提及该问题，并且重申该问题的解决对于建立族群间的信任和促进和解至关重要。但是信任无法建立在沉默之上。和解无法在家庭被剥夺了解亲人命运权利的情况下得到实现。

第2474 (2019) 号决议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框架, 但是框架必须用行动来落实。塞浦路斯提供了一个试点——不仅检验我们恪守决议的承诺, 而且也检验我们通过真相与问责来维护受害者尊严、治愈冲突创伤的集体意愿。我们敦促安理会继续呼吁在塞浦路斯和其它地方充分执行第2474 (2019) 号决议, 并且认识到查明失踪人员的命运不仅是国际人道法规定的一项法律义务, 而且也是一项道义要务和实现和平的前提。找回的每一个名字、查明身份的每一个人不仅为其家人带来解脱, 也再次确认了我们共同的人性。第2474 (2019) 号决议不应该仅仅是一个里程碑, 还应该成为代表希望、治愈伤痛和追究责任的一个充满活力的工具。

主席 (以英语发言): 我请科威特代表发言。

阿尔埃内齐先生 (科威特) (以阿拉伯语发言): 首先, 我谨感谢友好国家希腊和希腊常驻纽约联合国代表团为召开本次会议所做的努力, 举行今天的会议是为了跟进2019年6月在我国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期间提交的第2474 (2019) 号决议的执行情况。该决议提出了一个独特的人道主义层面, 它触及我们各方, 有助于加大国际上处理武装冲突所致失踪人员问题的的工作力度。我还要感谢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及和平行动部主管中东、亚洲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秘书长哈立德·希阿里大使阁下的通报。

第2474 (2019) 号决议是安全理事会在保护平民框架下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中的一个重要补充。该决议清楚明确地建立了一个强有力的体制和规范框架, 旨在摆脱一切政治考虑和利益, 保护武装冲突中的平民。

今天, 我们是在一个关键时刻跟进该决议的执行情况的, 因为我们看到地区和国际层面的残酷冲突不尊重民众的人性, 也不遵守国际决议或者国际法。实地的对抗基于一种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不人道的智力傲慢。因此, 今天有必要在本会议厅重申遵守该决议的必要性。

由于自私的决策盛行, 过去和当今的冲突影响了无数平民, 包括那些因武装冲突而失踪的人。战争和武装冲突给平民的总体生活造成悲惨的后果。任何战争、任何地区性或者国际冲突的爆发无不以失踪人员为主要受害者。他们迷失在黑暗中, 其家人的心也悬于希望与绝望之间。

在此背景下, 遵从人道主义和法律做法不只是一项义务, 而且也是一座桥梁, 把当事方与一个增进信任和奠定对话基础的共同谈判平台连接起来。提供信息、揭示失踪人员的命运、帮助他们重新团聚以及按照人道主义标准有尊严地对待他们不只是一种道义义务, 而且也是防止有罪不罚和追究责任人责任的基石。当所有人都遵守国际人道法规则时, 冲突的影响就转化为一个有助于实现和平的框架。

在这方面, 科威特的经历很有说服力, 因为科威特人曾在20世纪末经历了巨大的苦难。那段痛苦的经历及其人道主义层面影响了科威特的每一个家庭, 无论他们是科威特人还是科威特居民的家庭。因此, 35年多之后的今天, 我必须阐明那段经历及其人道主义层面。

对科威特来说，这是一道至今仍未愈合的深深的伤口。在实地努力搜寻308名
剩余失踪人员遗体的工作仍在继续。事实上，那段痛苦的经历导致家庭支离破碎，
使失踪人员与他们的孩子和父母离散。

但是，我们相信——正如六年前安理会以协商一致方式通过第2474 (2019)
号决议时我们相信那样——地球上的任何人不会被抛弃，失踪人员没有被遗忘。
我们希望在联合国、特别是在安全理事会旗帜下开展的搜寻工作将继续下去，并
且重申我们在这个纯粹人道主义问题上的坚定立场。

为确保在实地取得更多进展，我们认为，有必要任命一位联合国高级官员，专
门负责跟进查明所有失踪人员遗体的扩大进程，秘书长的定期报告机制也必须继
续下去。我们强调，安全理事会成员必须发挥作用。它们必须强调，一旦爆发任何
冲突，无论是国内还是区域冲突，有关各方都必须遵守第2474 (2019) 号决议的规
定。该决议为减轻家属和失踪人员的痛苦以及治愈他们的创伤提供了路线图。因
此，我们呼吁秘书长和实地维和特派团的所有代表遵守该决议，并在其向安理会
提交的报告和通报中提供冲突各阶段的全面信息。这样做对于安抚失踪人员家属
和促成团聚至关重要。它将加快和平谈判和解决、过渡期正义进程、和解、建设和
平以及保持和平的步伐，同时结束有罪不罚现象。

最后，主席先生，我赞扬你、友好的贵国及其常驻代表团召开本次会议。我感
谢政治和建设和平事务部及和平行动部主管中东、亚洲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秘书
长富有启发性的通报。我们祝愿他在努力捍卫过上体面生活的权利以及每个家庭
了解其子女命运——无论是死还是活——的权利时一切顺利。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现在请土耳其代表发言。

耶尔德兹先生 (土耳其) (以英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感谢你和
各位通报人。

在全球各地的平民首当其冲地受到武装冲突的影响之际，土耳其继续坚定致
力于加强保护平民的国际努力，解决令人痛心的失踪人员问题。解决失踪人员的
困境不仅是道义上的责任，而且对实现持久和平与稳定至关重要。维护家属了解
其失踪亲人命运的权利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联合国在促进根据国际人道法和人权法寻找、确认和送回失踪人员的有效机
制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个问题需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全面办法。土耳其一贯主
张在充分尊重国际法的情况下，为应对这一挑战作出非政治化、公正和注重成果
的努力。我们认为，有效开展合作，保持透明，并交流信息，对于解决失踪人员案
件至为关键。

失踪人员问题仍然是叙利亚冲突造成的最悲惨、最紧迫的人道主义后果之
一。数以千计的叙利亚人——实际人数也许更多——仍然下落不明，给无数寻求
真相和正义的家庭带来无法承受的痛苦。我们欢迎叙利亚新政府为解决这一关键
问题所做的努力。沙伊巴尼先生最近在4月25日向安理会发言 (见S/PV.9904) 时
宣布，将设立一个失踪人员问题全国委员会，这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我们
真诚希望，该委员会将透明、独立地运作，并与包括联合国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失

踪人员问题独立机构在内的国际机制密切合作。解决失踪人员的命运问题不只是一项人道主义任务。

加沙局势已恶化成为一场前所未有的人道主义危机，对平民的保护几乎荡然无存。加沙几乎所有人口都流离失所。数以千计的人，大多数是妇女和儿童，被打死或受伤，许多人仍然被埋在废墟下。自3月以来，人道主义援助持续遭到封锁，导致严重的粮食短缺，灾难性饥饿迫在眉睫。我们应提醒以色列注意其根据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包括第2474（2019）号决议——所承担的义务，并呼吁它全面遵守这些义务，同时充分承担责任。我们欢迎Edan Alexander本周早些时候获释，再次呼吁立即、持续停火，根据联合国决议释放人质和被拘留者，并充分执行由埃及、卡塔尔和美国斡旋达成的1月19日生效的协议。这仍然是确保向加沙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确保释放所有剩余人质和被拘留者以及维护国际法原则的唯一可行途径。

不能在孤立地处理塞浦路斯失踪人员下落问题，也不能在不考虑导致这场悲剧的历史背景的情况下处理这一问题。这个问题可追溯到1963年，是一个影响到土族塞人和希族塞人双方的人道主义问题。不应将其政治化，或将其说成是一个只影响到希族塞人的问题。1963年至1974年间，有相当多的土族塞人失踪，至今仍下落不明。人们应当知道的是，1963年以来失踪的土族塞人已证明大多是平民，而失踪的希族塞人则大多为军事人员。土耳其作为塞浦路斯的保证人，自塞浦路斯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于1981年成立以来，一直在政治和财政上大力支持该委员会的工作。委员会可以进入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的军事区。它被认为是该领域最成功的委员会之一。它一直在有效地运作，并继续取得成功的结果。我们认为，该委员会应在岛内双方的协作下，根据实际情况继续开展工作。

希族塞人行政当局代表对历史和现状作了选择性的片面的解释，这些毫无根据的指控确实应该得到其对应方、即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代表办公室的回应。尽管该办公室要求出席本次会议，但遗憾的是，今天在这个讲台上无法听到它的声音。土族塞人方面是在联合国主持下运作的失踪人员调查委员会的两个成员之一。在另一方有代表出席的情况下，它缺席这次会议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可接受的。土族塞人是1960年伙伴关系共和国的共同创始人，但他们在1963年被迫退出政府机构以及立法和司法机，这比土耳其的干预早了十年。土族塞人遭受的暴行在联合国档案中有详细记载。因此，联合国驻塞浦路斯维和部队于1964年部署到该岛。仅这一点就证明，塞浦路斯问题并非始于1974年，而是比这还要早十年。

在接下来的10年里，18万土族塞人多次流离失所，被迫生活在分散的飞地中。希族塞人代表长期以来一直误导国际社会，将塞浦路斯问题说成是“入侵”和“占领”问题，他们指的是土耳其在发生宣布希腊吞并该岛的政变后，才根据《保证条约》对该岛进行的合法、正当干预。

最后，土耳其重申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呼吁加强国际合作，以解决失踪人员的困境，维护人道主义原则，并确保追究责任。

我谨告知安理会，我与该委员会的国际成员——非希腊族，也非土耳其族——进行了交谈，他们对土耳其的合作和土族塞人方面感到高兴。

主席 (以英语发言)：我现在再次以希腊代表的身份发言。

我恳请根据第37条参加会议的会员国在提及其他会员国时, 在联合国使用其宪法规定的国名。

我现在恢复行使安理会主席的职能。

发言名单上没有其他人了。

下午5时40分散会。